

主持人语

今年9月18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始十四年抗战90周年。“九一八事变”不但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路向，也极大影响了一战以来的东亚世界与百年变局。在当前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外情势下，继续深入研讨“九一八事变”及其与百年变局的历史关系，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次工作坊邀请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国内学者20余人，围绕“九一八事变”及其与东亚世界、百年变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中日两国历史，与会者重点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艰苦的抗日历程，国民政府的事变前后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变迁，以及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化与对外政策的认识等。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东亚世界，有学者以法国侵占南海诸岛为例，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事变后发起第二次瓜分中国边疆的浪潮；有学者论述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以及对于中日两国的影响；还有学者从东亚国际环境与影响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百年变局，有学者从英国远东政策的演变、日本在东亚地位的变迁等方面，论述了“九一八事变”的标志性意义；有学者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演变，讨论了“九一八事变”对于百年变局的影响。

与会者一致认为，“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 90 年，但历史仍然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要继续加强学理性探究，从学术、学科与话语三大体系方面，努力提高和树立我国对于包括“九一八事变”在内的中日历史问题的研究水平与国际话语权。

臧运祜

2021 年 9 月 28 日

博雅工作坊第 45 工作间

“九一八事变”与东亚世界、百年变局

2021 年 9 月 18 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90年前，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不仅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后来的命运走向。今天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不仅是学术研讨，更是对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变化发展的一次总结。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实况一瞥》，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介绍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的事迹，第二部分概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武装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以磐石游击队为重点介绍了东北抗联的英雄事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与张学良的退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领导部分东北军在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政府驻地）进行了著名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第一枪。马占山是长春怀德县人，出身土匪，后被招安，成为东北军的军事将领，在“江桥抗战”中他采取诈降策略，在获得日军大量补给后举起抗战大旗。作战失败后，

他退入苏联境内，后回国试图劝说蒋介石抗日，在蒋介石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前往陕西协助张学良进攻红军。在西安事变中，马占山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关系。

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一直是东北抗日的主要力量，牵制了大量日本军队，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抗联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源于“九一八”事变后的黑吉辽三省游击队。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后，东北建立起工农红军部队，这是东北抗联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1933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直到1936年后才建立起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东北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赵尚志、杨靖宇，李红光，李兆麟、周保中等众多英雄人物，他们是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英勇精神的代表。

杨靖宇领导下的磐石游击队正是东北抗联的一个缩影。1958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通过实地走访，获取了大量历史资料，编纂成《磐石抗联记录》一书，生动形象地记载了磐石游击队的历史情况。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基础力量就是磐石游击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日会、打狗队。杨靖宇将这些民间武装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即磐石游击队，李红光担任部队的参谋长。此后磐石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磐石抗联记录》记载了杨靖宇的英雄事迹，不仅给中国人

留下了深刻记忆，也对敌人造成了难以消除的影响。杀害杨靖宇的主要凶手之一岸古隆一郎一直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日本战败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就一定不会亡国。”除杨靖宇外，东北抗联给日本普通士兵也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研究当时日本士兵寄回国的“军事郵便”，可以发现日本士兵对抗联十分恐惧。韩东育认为，东北抗联一方面在军事上牵制大量日军，使日军士兵感受到战争的痛苦，同时在组织上吸纳了许多朝鲜籍战士和指挥员，具有国际性的特征。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彭敦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九一八事变”对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力图建立的五院制政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后在抗战时期名存实亡；第二部分指出“九一八事变”对蒋介石制度性权力的发展路径构成了巨大打击，但并没有阻止他在抗战开始后形成制度性的个人独裁；第三部分指出反蒋势力和蒋介石军事势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制度构建对抗战体制构建具有深远影响。

蒋介石是依靠其军事权力实现政治崛起的。北伐战争后，蒋介石成为党国体制下的国民政府主席，按照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确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司令，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国政要，但国民政府主席无权单独公布法律，法律和命令的公布要经国务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才可以生效。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其制度性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在国民党党内蒋介石只能扮演组织部长、常委委员、政治会议委员的角色，并不掌握决定性权力。

1929年6月之后，国民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蒋介石的限制，通过了五权权限决议案，规定立法院拥有决定全部法案的权力，国民政府主席并没有这一权力。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实现了对胡汉民的控制，打破了原有权力结构。1931年6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再次修改，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对内对外都代表国民政府，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蒋介石的制度性权力得到空前的拓展，掌控了人事权、立法权和命令权。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成为拥有巨大权力的中华民国元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汪精卫与胡汉民在“党内团结、共赴国难”的旗号下，联合迫使蒋介石下野，瓦解了蒋介石建立的元首制政治体制，重新建立了党权体制下的虚位元首体制。然而，蒋介石作为军事领袖，在国民党内部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新掌控军事权力，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五院体制外新的权力单元，形成了“六权分立”的局面。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在影响蒋介石制度性权力的同时也影响了政治体制。

虚位元首制和五院制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主要形式。五院制是孙中山设立的，目的在于防止权力集中，出现个人独裁。五院制权利并不完全平衡，立法院和行政权的权力更重，但实际上，五院之外的军事委员会掌

握了更高权力。蒋介石并不喜欢五院制，因此设法实现对五院的全面控制。“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试图通过实行“宪政”，召开国民大会，遏制汪精卫与胡汉民的力量，但没有付诸行动。最终在虚位元首制下，汪精卫掌握了行政院，蒋介石与汪精卫进行合作，实现了五院制的平稳运行。然而，汪精卫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并不稳定，而蒋介石却能稳定掌控军事权力，其结果就是五院制下权力分散、效率低下。这也影响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对一系列事件的处理。总而言之，“九一八事变”后恢复五院制与应对民族危机的现实需求背道而驰，给抗战造成了很大不利影响。

虚位元首制具有“战时性”，但其行政效率低下，因此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剿匪”的需要，将更多行政权交给军事委员会，再次扩充了蒋介石的军事权力，在“剿匪”地区掌握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支配权。“七七事变”后，这种独裁权力反而发挥了作用，加快了向战时体制的转换。然而，五院制和军事委员会在抗战时期并行，导致国民政府机构臃肿，不得不将其统一于国防委员会或国防最高会议之下，由此形成了蒋介石带有军人色彩的个人独裁权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上海南京北平之行》，主要介绍了中国对李顿调查团的接待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的政治原因和出乎意料的政治后果。通过比较中日两国接待李顿调查团，张生教授认为东亚国家倾向于通过对外国人的高规格接待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访问

中国，走访了上海、南京和北平，试图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在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中，中国政府费尽心思，以精细的接待试图达成政治目的。李顿调查团在南京得到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顾维钧的隆重欢迎，迎接过程也经过精心设计。李顿调查团抵沪时，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参与迎接，新闻记者与欢迎乐队烘托起热烈的气氛。中国政府还特意指示上海方面要将调查团带到“一·二八”抗战的作战区域，试图给调查团留下深刻印象，促使其同情中国。在接待过程中，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人士均表达了自身的政治诉求。但是李顿作为政治老手，拥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很难被这些场面打动，在与中国政府的会谈中时常表现尖锐。汪精卫试图通过细致的接待，在会谈中得到李顿调查团成员的同情，这一努力没有达到目的。

李顿调查团在北平的接待规格最高。以接待费为例，张学良给调查团每位成员每日的接待费为 10 元，相当于当时北平小学教师一月的工资。然而，在北平期间与中国方面进行会谈时，李顿却站在日本的立场发言，对日方提出的要求多有回应，对中方提出的要求却回应寥寥。因此，中国方面认为李顿调查团对维护中国利益并无帮助。

日本作为旁观者，对中国的接待行为嗤之以鼻，认为中国过分热情，丧失尊严。但实际上，日本在东北接待李顿调查团时也十分热情，试图给其成员造成东北“共匪”猖獗的印象，从而使调查团对日本产生好感，日本外务省也乐观地认为调查团将得出对日本有利的报告。然而，调查团最终的报告却是对中国有利而非日本。例如，对“九一八事变”当

天情况的描述，李顿调查团给国联的报告指出，“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关于伪满的合法性问题，报告称，“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成，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关于东北与中国的关系，报告称，“东三省之为中国东三省，直与其大部分移民所自来之邻省河北山东无异。”最终，中国无条件接受了这一报告，日本则以退出国联表示抗议。张生认为，尽管东亚国家在接待外国人的时候，喜欢高规格的接待，想获得对自己好感，然后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在李顿调查团这件事上，最后的结果却令中日两国均感到意外，这值得进一步去探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国际交涉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方针再检讨》，内容主要围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与国联及美国的交涉过程展开，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英、法、美之间的大国博弈，以及国际联盟的影响力与中日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求助于国际联盟，并试图通过向九国公约签署国和非战公约签署国求助，引入美国和苏联两国的介入。这一时期国联由英法两国控制，而英法两国并不期待美国参与事件的解决，因为美国的介入将损害国联的威信。法国则主要将国联视为欧洲的国际机构，将“九一八事变”涉及的中国东北视为亚洲事务，因此不愿国联介入，从而被卷入亚洲问题。

侯中军表示，通过翻阅档案可以发现，从“九一八事变”

到“一·二八事件”，中国的国际交涉存在一个复杂的外交面向。国际联盟针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两次决议，第一次的决议并不具有强制性，仅仅表示国联知晓了中日之间的问题和两国的态度；第二次决议则明确要求日本军队要从东北撤军，这遭到日本的反对。看似中国获得了外交胜利，实际上中日却陷入了一种外交僵局。此外英、法、美三国试图压制中国，要求中国直接与日本谈判，日本则主张东北问题要与整个中国问题合并解决。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派出调查组先于国联调查团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美国认为英法两国不能理解远东局势的紧张，担心英法在国联的决议会激怒日本国内军部势力，压制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美国试图要求中国政府撤换张学良，由日本接受的领导人治理东北。但事实上，这完全是日本国内释放的烟雾弹，以此迷惑国际社会，其目的是直接抛开中国政府，炮制出伪满洲国。

通过研究档案发现，在英美交涉过程中，英国有很多不利于中国的陈述，认为对中日两国应“各打五十大板”。但从根本上看，英国与中国存在一致利益，即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因此其态度也体现在李顿调查团的行为上：虽然调查团报告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支持中国。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华盛顿体系的崩溃：“九一八事变”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主要围绕美国和日本在东北问题上的博弈展开，探讨东亚秩序崩溃的主要原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期，东北问题一直是东亚国家关系的核心问题。东北问题最初是沙俄和日本大国角逐的结果，随着美国的介入，东北逐渐成为东方的巴尔干、东亚的火药桶。塔夫脱担任总统后，美国试图在东北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利用金元外交改变日俄战争后的东北局势。金元外交的主要执行者是威廉·施耐德，他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其岳父是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哈里曼，因而在美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施耐德的推动下，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组建四国银行团，试图推动满铁国际化。然而，威尔逊总统时期推行单边外交，美国在一战前退出了四国银行团，英国和日本成为国际银行团的主导。一战后，美国试图凭借经济实力，尤其是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地位，组建新的四国银行团，利用国际资本力量影响东亚秩序。然而，新的四国银行团遭到了中国的抵制，在日本却获得欢迎，这是华盛顿体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东亚国际体系是失衡的，日本利用银行团借款大力投资东北，这加剧了中国内政的动荡，为资本运行埋下隐患。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日本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日本国内被压制的军部势力再次抬头，军部指责时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的国际协调外交是一种软弱外交。在这一背景下，关东军试图以武力确保东北利益。由此来看，华盛顿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国际资本体系，一旦其经济内核出现问题，体系就会彻底崩溃。“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则正式宣告了这一体系的破产，因为美国无法按照《九国公约》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资本受国内经济萧条影响开始与日本切割。美国政界一直存在亲日和亲华势力的论争，“九一八事变”则加剧了两种势力的较量。以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为代表的坚定亲华势力在这一时期转向亲日，直至冷战他仍支持扶植日本、遏制中国的政策，协助乔治·凯南在美国的东亚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建标认为，重新审视“九一八事变”可以发现资本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华尔街的国际财团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维系着华盛顿体系的稳定。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资本维系下的国际体系将陷入崩溃。此外，重新审视“九一八事变”也可以发现，蒋介石政府、美国、苏联和日本各方眼中的东北并不一样，存在自我与他者的认识分歧。在蒋介石政府眼中，东北是边缘地区，然而在其他国家看来这里是东亚的心脏。所以不同国家学者的思维和看问题的方式，有各自地域的局限性，也有历史记忆造成的局限性。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结合美国、苏联、日韩学者的视角。东北问题在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史是核心问题之一，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近代日本军政关系演变中的侵华战争问题》，主要围绕近代以来日本军队发展的过程展开，从军政关系角度入手。他认为“九一八事变”使军部势力战胜政党势力，并建立了法西斯主义。

国内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交叉性，学术界从战争史、社会史、外交史和地区史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学术界也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

斯主义等理论入手，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源进行了研究。徐勇主要从法西斯主义入手，强调历史学、政治学与军事学的学科交叉，从军政关系角度关注日本的侵华战争问题。

军政关系又被译为文武关系或民军关系，日本则表述为政军关系。军政关系主要是从军事和军队的角度研究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从军政关系角度看，日本军部是军事机关，军人不应干政。在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确立之初，日本的确有禁止军人妄议政治的规定。但事实上，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人就一直介入政治，日本近代政治史俨然就是军人干政史。军部逐渐成为政治化的机关，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原点。

日本进入近代之初，在天皇制国家体制下并没有直属于天皇的军队，只有萨摩、长州、土佐三藩贡献兵员形成的“御亲兵”。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日本建立镇台作为军队。1888年日本军队改为师团制，由此日本正式建立起国家军队。师团制的国家军队明确了“外征所用”，是可以对外的，由此军队性质发生变化。此后，新型国家军队逐渐政治化，开始参与政治、全面控制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政关系发生飞跃性变化的标志。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小团体“一夕会”，按照既定计划发动的对外战争。这一事件使得在20年代处于下风的军部势力重新抬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包括三月事件、十月事件、1933年相册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等。在这个过程中，1934年日本陆军新闻班发布的宣传册宣布了军队政治纲领，这成为之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这一纲领主要强调战争是世界创造之母，

是文明创造之母，强调军队要在思想、政治、文化、国防、教育、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控制。在“五一五事件”中，日本首相犬养毅被杀，日本政党内阁自此结束。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广田内阁上台，标志着军国主义一元化政治的完全确立，这就是军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统一。总之，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发展历程本质上就是不断军事化的过程。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反苏防共与东北问题》，主要围绕日本的“反苏防共”国策展开，强调“九一八事变”与日本的反共政策密切相关，也与日本将苏联视为头号假想敌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

日本作为近代天皇制国家，自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以及苏俄社会主义爆发开始，防范共产主义传播就是日本政府的重要国策。与此同时，日俄战争使日本一直将俄国乃至此后的苏联视为头号假想敌，认为是日本在远东扩张的障碍。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成为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反苏对日本政府而言，兼具反苏反共两重意义，表现在日本远东政策上就是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北进政策的出台。1918年日本政府与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到1936年日本政府与宋哲元当局签订《华北防共协定》，日本政府都是以防共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渗透中国，企图控制华北。日本宣扬的“东亚新秩序”也是以反对共产国际势力为基础的，可见反苏防共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广田弘毅内阁制定的《国策基准》明确提出北上进攻苏联的计划，并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1939

年的诺门坎战役是日本北进政策的一个试探，由于遭受惨败，日本最终放弃北进，转而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反苏防共这一国策有密切关系。第一，从国内角度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建立的天皇制政权，代表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坚决镇压。1925年颁布的《治安维持法》，规定对于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制财产制为目的的团体或个人可以拘留、劳役，甚至判其死刑。这使得日本国内形成了反共的意识形态基础。

第二，日本试图在东北建立抵御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屏障。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军部及右翼势力一致认为需要控制东北。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苏联完成五年计划后，其军事力量将得到极大加强，共产主义对东北乃至朝鲜的威胁将极大增强，为此日本军部希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加强对东北的控制。

第三，日本对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表示忧虑。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相继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并于1924年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日本认为中国北方存在“赤化”的危险，因此有必要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防止自身占特殊利益的东北受“赤化”影响。

第四，日本认为东北是苏联南下的重要通道，也是日本北进侵略远东、实行军事扩张的重要通道。坂垣征四郎曾提出，俄国只要跨过国界，占领朝鲜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日本军部势力强调为了抵御来自俄国的威胁，巩固在朝鲜的统治，必须占领东北。由此来看，日本将东北视为防止“赤化”

的隔离带。

然而，苏联百万大军最终于 1945 年 8 月南下，消灭日本关东军，标志着日本通过控制东北，实行其反苏防共国策的企图最终破产。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表明，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日本的反苏防共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陈谦平的发言题目是《“九一八事变”与法国侵占南海诸岛》，主要围绕中法两国对南海岛屿主权争夺的历史展开，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法国趁火打劫，试图侵占中国南海诸岛的历史。

中法两国争夺南海诸岛的归属权有特定的历史背景。1887 年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续议界务专条》，划定了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边境线。在签订条约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政府的坚持，法国不得不妥协，承认“所有商论未定之处均归中国管辖”。这实际上承认了陆地边界向海洋的延伸，划定了中法两国的边界线，即东经 108 度线。该边界线成为现在“九段线”的起源。1907 年 8 月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为寻找鸟粪石，登上东沙群岛，并将其视为无人岛，擅自进行命名。清政府于 1909 年 10 月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后将该岛收回，并于同年派军舰巡视西沙群岛。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按照《国际法》设置了相关管理机构，再次确定了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岛屿主权。

法国政府无法找到有效证据证实上述岛屿不属于中国，因此对以上事实表示承认。1920 年日本三井公司为开采西沙群岛的鸟粪石，向法国驻印度支那海军司令雷米进行询问，

雷米在询问法国外交部和印度支那政府无果的情况下，向日本方面答复，声称西沙群岛不属于法国，进一步证实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1921年广东省政府将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称之为崖县行政管辖区。法国政府对中国的管辖权也并没有提出异议。同年8月，法国总理兼外长白里安在回复印度支那政府时指出，1909年中国政府即在南海诸岛确立主权。综上所述，法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并无异议。

“九一八事变”后，列强再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苏联占据外蒙古，英国在西藏提出划定“麦克马洪线”，法国则趁机侵占南海诸岛。1930年，法国开始侵占南海岛屿，1930年4月占领南沙群岛，强行称之为“无主岛”，将其改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1931年12月，法国声称对西沙群岛具有先占权，其实际目的在于转移中国注意力，巩固其对南沙群岛的占领。随后，法国又于1933年占领了中国八座岛屿，共计占领中国岛屿九座。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国又趁火打劫，秘密占领了西沙群岛。法国占岛的目的在于防止日本对海南岛的扩张，巩固自身在中国的利益。然而，法国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1938年至1939年，日本派遣军队将法国占领的南沙和西沙群岛全部拿下，并将其改名为新南群岛。最终，法国在“九一八事变”后所攫取的南海诸岛主权只是一种虚构的主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铁军的发言主题为《“九一八事变”的国际背景与国际影响》，主要从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角度分析“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及其带来的

国际影响。

于铁军首先从安倍晋三“终战 70 周年”讲话入手，分析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日本认为“九一八事变”乃至整个侵华战争的起因主要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与一战后形成的新国际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密切相关。与中国观点不同，日本并不认为其侵略行为是蓄谋已久、按计划逐步进行的，而是由于当时的政府在应对国际环境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所引发的。

当时的大国主要是英国与法国，美国与苏联并不包括其中，德国与意大利也没有崛起。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脱殖民化和民族自决运动持续高涨，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朝鲜半岛爆发三一运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相继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大众政治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日本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不断高涨，成为之后昭和维新的群众基础。

1929 年至 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产生重大政治经济后果。首先，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走下坡路。美国在一战后一直被视为榜样，但大危机造成美国的衰落，也使美国制度吸引力下降。与之相对，极权主义国家吸引力上升，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开始崛起。其次，思想层面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国际经济领域保护主义占主导，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力下降。

上述国际因素影响了日本对形势与战略的判断。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外交政策主要是维持和扩大在东北的权益，这也是其“大陆政策”的核心。此外，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还要与各国保持协调关系，维持外交平衡，即实行协调

外交。然而，“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面临的国际压力陡然上升。首先是1928年苏联开始工业化，实力猛增。其次，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中国国民党由南向北开始北伐战争，使日本感受到中国民族统一力量的压力。第三，美国在大危机爆发后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日本对美出口受到限制，日美两国经济依赖程度不断下降。美国海军力量有所上升，令日本感受到威胁。在多重国际因素变动影响下，日本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政党政治转变为军部政治，协调外交转变为自主外交，由实行金本位制转向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明确提出日本的侵略逻辑，即以关东军推动日本军部，占领东北实现日美争霸，解决日本面临的经济危机。然而，日本占领东北实际上是自掘坟墓，如果说日本是在剖腹，那么中国毫无疑问就是介错人。

总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当时国内外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局做出的一项灾难性选择。“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了激烈较量，各大国也基于自身利益做出政策取舍，而国联作为一战后新建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在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反映出当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局限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的发言题目是《“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官方对事变真相的调查》。张俊义利用美国档案资料，围绕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调查过程进行论述，认为美国政府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消极，但通过官方调查较为清晰地明确了日本的意图并采

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美国外交官索尔兹伯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担任美国驻日外交官，精通日语，是美国政府的日本通。“九一八事变”后，索尔兹伯里与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共同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留下了丰富的档案资料。此外，担任过国民政府外交官的高宗武曾出版英文著作《深入虎穴》，对美国在东北的调查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反应迅速，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日记中做出明确判断，认为这一事件是日本军方发动的突然行动。然而，美国政府在这时还难以断定是军队的擅自行动还是日本政府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在综合各方情报后，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军方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与日本政府的政策相违背。因此，史汀生主张给日本政府控制局面的机会，避免刺激日本民众。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有意让国际联盟接手调停中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缓和国际舆论采取了很多宣传行动，强调日本对东北没有领土野心。然而，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美国逐渐担心日本将完全占领东北，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索尔兹伯里和汉森的调查任务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调查战斗发生地点，以及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范围；第二，调查日本军队的正当性并对其进行判断；第三，搜集证据，判断日本军队的占领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调查团由长春出发，经吉林、敦化后回长春，再到洮南、四平、奉天、营口、安东，最后回到奉天结束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日本对调查团成员进行跟踪，避免调查团成员与中

国人接触，但调查团仍然收集了大量情报，并以电报的形式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索尔兹伯里等人认为日本进攻中国军队是为了长期独霸东北，中国人对日本的占领表示愤恨。通过此次调查，美国基本了解了“九一八事变”的全貌，同时也表明尽管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采取观望态度，但仍旧积极关注事态变化。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景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二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合作与博弈》，论述了二战时期的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以及双方的博弈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美关系整体上逐步进入最佳时期。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更是以战略合作同盟者的身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步力量。经济方面，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和财政援助。从平准基金到5亿美元财政援助，中美在财经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无息、无期限、无需担保的借款合作表明中美两国将矛头对准了日本这个共同敌人。军事方面，美国通过《对华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物资和军事服务，合计8亿多美元。盟军中国战区的设立标志着中美军事合作的加强。美国航空志愿队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在多个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此外，中美合作还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意义。在《联合国宣言》签署时，中国在美国的精心安排下第四个签署这一文件，进一步表明了中国的四强地位。在开罗会议上，中国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上述一系列国际活动说明中美合作的层次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拓宽。

在合作之外中美也存在博弈。起初是商业利益博弈，其

目标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主要集中在中美商业贷款问题上。全面抗战爆发后，中美在平准基金和商业信贷方面仍有较大分歧。军事方面，中美在战略方向上存在分歧。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在战役指挥上对美国不满。因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中国对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也有不满。太平洋战争后期至 1947 年初，中美在在在华美军垫款结算上存在分歧：由于法币与美元汇价存在官方价和市场价差别，当法币汇率一路下跌时，中国以官方价向美国支付法币，由此引发系列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并不满意，但在全面抗战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明确了加强与美国在内的盟国合作，才是战胜日本的关键。因此，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中美关系中合作仍是主流。

本次工作坊设置了主题为“九一八事变”与百年变局的圆桌讨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以欧洲列强从远东的撤退为主要内容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意义。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国在远东的势力逐渐衰弱，其“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动摇。1902 年，英国与日本建立英日同盟，利用日本抵御德国和俄国，其代价就是默许了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也为自身培养了潜在的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其目的不仅是独占中国，还意味着要挑战西方国家。而中国因派遣劳工参与一战也获得了战胜国的地位，这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与日本较量创造了条件，此外华盛顿会议的召

开也为中国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机会。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英国主动提出美国主持这次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中，各国达成了《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和《九国公约》。日本认为自己在华盛顿会议中没有得到好处，《九国公约》明确了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直接与日本的殖民主义理念相违背，这成为后来日美对立的重要原因，也是“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出台“史汀生主义”的重要原因。

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取代英国走向全球霸权的开始。美国与英国不同，英国依靠外交协调领导世界，美国试图通过制定原则领导世界。在英国衰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开始，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也打击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直指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英国被迫步步后退，归还汉口、九江、镇江、厦门和重庆等地区的租界，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英国也力不从心，主要表现为“九一八事变”后在国联的颀颀行动，由此开启了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此后，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国际地位逐渐被后来者的日本取代。“九一八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在百年变局的视角下反映出的是西方开始从东亚撤退的历史进程，这一事件也是中国摆脱殖民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从国

际格局、经济因素和研究方法等角度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他认为，近代以来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三大事件均与中国东北有关，分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必然会影响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在衰落过程中遭到其他大国的瓜分，在瓜分过程中引发各种利益纠葛，这就是国际格局变动的主要原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标志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在这一过程中英美两国表现各不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作为东北利益的关心者却保持着漠然态度，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将自身精力更多置于西方而非远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单独面对日本的压力，这给东亚国际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但经济危机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并不同步。日本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初的1929年即遭到冲击，通过“九一八事变”对外转化了经济危机。而1933年至1935年中国才开始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正常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也推动了中国左翼革命在基层的渗透。

民族主义也是研究“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因素。在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无论是《何梅协定》还是《秦土协定》，除了要求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撤出华北，还要求国民党党部撤出，原因在于国民党党部在宣传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在日本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反日，而观察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民族主义才是中国发展的历史主线。

汪朝光认为，研究“九一八事变”还应注重交叉性。不

仅要掌握中日英俄四种语言，了解国际法等相关知识，还要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方法充分交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九一八事变”，真正理解民族主义，理解中国的百年变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杨伯江研究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他指出，第一，“九一八事变”对于国际集体安全思想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对于国际机制特别是对后来联合国制度的设计理念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的战略心态都比较担忧，以苏联和法国为代表提出了自身的集体安全方案。二战后期开始酝酿、设计、建立的联合国则是“九一八事变”后集体安全的重要创举。联合国与国际联盟相比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在传统安全下，联合国强调权力集中式的集体安全，在应对有限战争、局部战争、小国战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大国战争的预防性也更强。其次，联合国吸取了国联教训，在集体安全制度上作出拓展，将安全保障的概念延伸到经济、民族等问题上。

第二，“九一八事变”开启了百年大变局。其一，国际关系不再是传统发达国家私下的博弈，形式上发生了由台到台上的转变；其二，权力转移方式有了新的可能；其三，影响国际竞争结果的变量增多。“九一八事变”是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发生的，自这一事件后，新兴国家开始参与到国际关系的博弈中。此外，“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实现了对国内政治力量的整合，为民族解放创造了条件。“九一八事变”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二战结束后欧洲不再是世界中心，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纷纷衰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奠定了基础。

第三，“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实际上是两种观念或主张的对立。在美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时，日本却依旧以殖民主义手段侵略中国，这为之后的日美冲突埋下伏笔。应注意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有领先之处，值得中国学习。

第四，“九一八事变”对日本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终结了大正民主和政党政治，开启了军部法西斯主义体制。对于战后日本历史，“九一八事变”同样是一个痛苦的开始。因此在回顾“九一八事变”历史的同时，也应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注“九一八事变”与当前日本社会主体价值观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强调，目前中国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相对匮乏，需要利用日语资料和日本文献进行相关研究。他认为中国史研究者要与日本史研究者合作，相互配合，才能对“九一八事变”的全貌有所了解，在研究中要避免各自为政。此外，“九一八事变”存在前推和后续的问题。“九一八事变”的前身是日俄战争，日本借此机会进入东北，对中国领土步步蚕食，最终以武力方式入侵中国。“九一八事变”刺激了中国的民族情绪，为后续“一二·九”运动爆发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说过，“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为抗日战争做了思想准备、人心准备和干部准备，许多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因此，自日俄战争至全面抗战，“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历史

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由此来看，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具有合理性，“九一八事变”是一战后首次由一个国家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国家纠纷的事件，是一个恶劣的开端，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支持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等。总之，“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七七事变”是进一步发展阶段的标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唐利国从“九一八事变”与中日关系的百年发展入手，认为“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也是对中国的第二次启蒙。

唐利国认为，百年大变局开始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在此之前，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亚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独立世界，英国等西方列强打破了这种封闭，改变了东亚的基本格局，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九一八事变”以前，中国面对百年变局时总体上并不积极，而日本则完成了快速的转型，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因此某种意义上看，日本在这一时期代表着东亚的进步势力，中国则代表着保守势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极力将中国渲染成野蛮落后的国家，在西方世界将自身标榜为文明进步国家，博取西方的支持。日俄战争后，许多中国人也对日本表示肯定，认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是一种进步。孙中山在日俄战争后表示，日本面临着霸道还是王道的选择，最终日本走向了霸道，即侵略道路。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日本近代的历史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对于国家发展处于迷茫状态，当时，军

部势力受到压制，逐渐与法西斯主义加紧联系。日本政府为避免下层军官与民间法西斯主义结合，威胁到国内稳定，将这些下层军官调往东北，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因此，“九一八事变”也是日本祸水外引的结果。随着军部逐渐掌握日本国家主导权，军部法西斯建立后，日本走上一条无法停止的战争之路。由此来看，“九一八事变”煽动起日本人狂热的战争热情和侵略性，日本逐渐走向全面侵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由此也步入衰落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启蒙，这种启蒙主要集中在民族主义方面。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相较而言并不注重民族主义宣传，“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试图通过全民族合作，探索救亡道路。这条道路完全是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进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胜了美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历史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走向战争和衰落（尽管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复兴，但将自身完全容纳进西方道路之中）；中国则开启了不断前进的独立自主的历史道路。